

◀ (上接7版)

家中精美的床榻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架破竹榻，坐在上面的主人公变得两肩高耸，面目愁苦，显然已经被鸦片夺去了生命力。他穿着普通的布衣，恐怕已经典当了最后一件好衣裳。妻女衣着简朴，首饰尽除，正在纺纱以贴补家用。昔日的富贵之家沦落至此，不得不令人叹惋。最后一幅图中，主人公迎来了他的结局——成为一具躺在破烂草席上的尸体。他的表情并不安详，皱起的眉眼向读者表达着他死前所经受的苦难。讽刺的是，他身旁的祭品仍是一盘糕点，他却无福消受了。

不难发现，《堕落》与顺呱的《劝诫图》存在着不少共同点。在主人公身份、情节设计上相似，都遵循着“吸食鸦片导致败身破家”的基本叙事逻辑。两套组图之间也存在着差别。比如，故事起点不同：一是从家中染上烟瘾的长工说起，一是主人公自己身现鸦片作坊。结局亦不同：《劝诫图》的富家子一贫如洗，丧失劳动能力，并未死亡，《堕落》的最后，鸦片直接导致了主人公身死。这差异的背后，或可归因于两组作品创作时代有别，鸦片问题严重程度亦加剧。鸦片战争爆发前，常随、家仆是吸食鸦片的重要群体，吸食鸦片风气传播的途径之一便是相互推荐。许多富人或出于好奇、或受人诱惑，由此染上恶习。但至1858年鸦片弛禁之时，鸦片生产、加工、销售的产业链已经成熟，人们获取鸦片的难度大大降低。更重要的是，在时人眼中，鸦片与旱烟、水烟等休闲方式已无本质差别。正如画中所绘，丈夫吸食鸦片，妻子在一旁抽水烟，二者并行不悖，吸食鸦片几乎已成为晚清社会中的常见现象。

显然，《堕落》中的主人公命运更加悲惨，自甘堕落的鸦片吸食者形象也愈发恶化。这种效果的达成并非偶然。六幅本的《堕落》只是其原作的一部分，换言之，《伦敦新闻画报》选择性地刊登了这套作品。报道中提到该图“取自中国本土的作品”，也意味着刊登时报刊可能对原图进行了部分改动。该篇报道开篇提到：“最近本刊特约画师在本刊上发表了数幅有关中国人生活和举止的插图，作为对这些插图的适当补充，我们向读者展示这套描绘吸食鸦片恶果的系列版画。”此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之时，英法联军已攻陷广州，北上大沽。该报自1857年4月开始，陆续刊载了名为“中国速写”的十余幅插图，内容涉及香港、广

州、福州等地的街景和军事要塞，还有对中国人形象及生活场景的描绘。即使是一位此前对鸦片一无所知的英国读者，也可以大致了解鸦片对吸食者造成的危害，同时对有着“毁灭性嗜好”的鸦片吸食者产生负面的印象。而《伦敦新闻画报》在这套图的注解中加入了大量说明性文字，也在帮助读者形成这种印象。比如第二幅图的解说中提到：“烟瘾一旦养成，它邪恶症状的出现就不远了。这些症状包括四肢和肠道的疼痛、食欲不振、睡眠不佳、消瘦、记忆力减退、思虑过甚、以及整个人道德、精神和生理上的普遍性衰退。甚至中国人自己也不愿信任一个有烟瘾的人，并且认为他有可能犯下任何罪行。”报道在最后对鸦片贸易提出了批评，但将罪责归咎于当时已经失去贸易功能的东印度公司，认为这是“我们东印度公司风格上的污点”，而绝口不参与走私鸦片的散商和英国政府在无数悲剧中应负的责任。在两国交战的敏感时期，这组原为表现鸦片恶果的组图，在《伦敦新闻画报》的解读下成为中国鸦片吸食者堕落的写照，所引发英国读者的联想，恐怕也是抵触多于同情。

直至1877年，《万国公报》刊载了全套十二幅的《劝戒鸦片醒世图》，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通过图像向国人宣传鸦片的危害。这套图对此前鸦片劝诫图的标准叙事有所继承。如以富家子弟为主人公，其形象随着故事的进行而变化，也保留了变卖家产、妻子怒摔烟具的情节(图2)。1910年刊登于《图画日报》上的《鸦片烟毒之现象》(图3)，总数增为50幅，添入了更多人物和情节，使之更贴近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形，同样也是对“鸦片导致破产损身”这一母题进行复写。

劝诫图在后世的发展演变，都显示出早期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然而，早期鸦片劝诫图多由外销画师创作，虽以烟鬼堕落为题材，其预设读者却非中国烟民，而是那些对中国风俗抱有好奇的西方顾客。在劝诫图传播过程中，西人报刊媒体在刊登时对内容进行加工和再解读，一定程度上使作品“失真”，鸦片劝诫图的警示功能也在被改造的过程中遭到了弱化。这种“事与愿违”令人惋惜，但也是我们在面对历史图像时所必须了解的历史语境。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袁复礼的北庭考古

朱玉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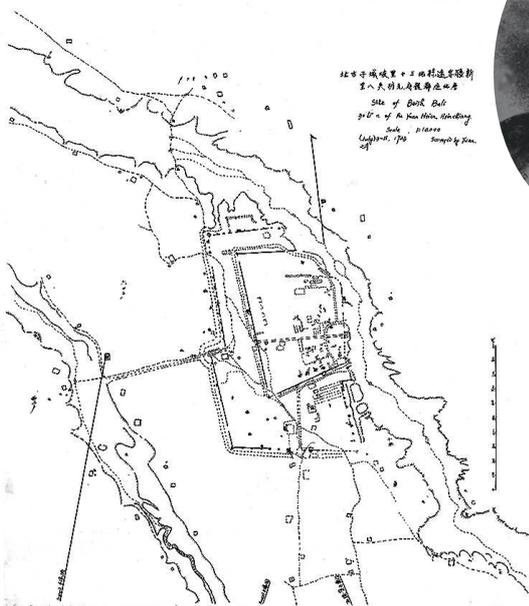
天山恐龙的发现,对于门内门外的人来说,三言两语都能够说出它的显性价值,因此成为袁复礼甚至整个西北科考团考察成果的高光点。其实科学考察期间他们所做的所有工作,还远远没有得到全面的认识和继承。譬如说袁复礼的北庭考古。

北庭考古是一次意外。“5月25日,我们在水西沟西侧的大隆口遇见旧土尔扈特两位年轻王子。他们说:山中正患瘟疫,那里的蒙族都要搬到北塔山东南居住。必须等到夏秋季节高山新雪部分融水下冲后,河水变清,才好进山长驻。我们感谢他们相告的厚谊,随后就改道去邻近的唐北庭遗址,进行考古工作。”

1928年天山北坡的一场疫情,使得山里的牧民自动采取了与世隔绝的方式,也告知外人远离疫区。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卫生防疫方面,当然也走在了西北科学的前沿。科考团远征进入内蒙古地区的时候,随队医生就给每个团员不止一次地打了多种防疫针。接受过现代教育的袁复礼自然深知疫情的危害。本来,沿着水西沟东行,袁复礼在大龙口的恐龙发现要提前半年,现在只得前往平原地带从事考察工作。

袁复礼的北庭考察,是北庭现代考古的第一次。一个重要的检验品,就是第一张1:10000的《北庭故城遗址测绘图》在1928年7月经由袁复礼测绘完成。今天,北庭故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由北大的校友、社科院考古所的郭物接掌,他多次告诉我:袁复礼的北庭图是目前所见最好的。

我们定位袁复礼是“地质学家”的称号时,只是找到了他一生成就的高光点。追寻袁复礼的求学经历,会看到1915年他从清华学校理科毕业之后,就获得庚款赴美深造,先在布朗大学从事了两年生物学、植物学、世界历史及考古学的科班训练,然后再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地质学、



▲▲袁复礼(1922年摄)与他所制《北庭故城遗址测绘图》

测量学等学科。那个时候真正的学者,都无所谓读学位、拿文凭,而是哪里有兴趣的学问,就到哪里去学习。1921年作为孝子的袁复礼因母亲病重而辍学归来时,除了一身的真功夫,丝毫没有整一张“克莱登大学”博士学位的兴趣。斯文赫定写作《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称袁复礼“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优秀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地形测量学家”,这才是学界的定评。如果斯文·赫定懂得中文,他还会惊异地发现,1923年袁复礼陪同农商部的矿政顾问、也是瑞典人的安特生去甘肃考察的时候,还采集了当地30多首花儿,在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发表,被歌谣界称作了“花儿研究第一人”呢!

袁复礼回国以后所从事的第一件工作,其实就是考古。1921年,他和安特生挖掘了仰韶遗址,第一次发现了中国史前文明,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袁复礼的第一张测绘图,是《仰韶遗址地形图》,堪称“中国考古第一图”。到了北庭的袁复礼,在一个半月的考古工作中,在也是仰韶考古就开始合作的采集员白万玉的协助下,画出至今难以超越的北庭测绘图,无疑是牛刀小试。考察时期主要跟着袁复礼做技工的白万玉,后来也成为考古学界的一把好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成为定陵考古现场的指挥。这次在袁复礼的旧照中,我们看到多张白万玉年轻时候的工作照,真个是意气风发!

西北科考团的地质考察,一个人管一摊,北大的丁道衡去了南疆,袁复礼就分管了北疆,地域再

大、门类再多,你也得拿下。袁复礼除了在准噶尔盆地北侧的低地白骨甸、元湖等处从事考察外,东部天山的最高峰博格达也留下他从事冰川测量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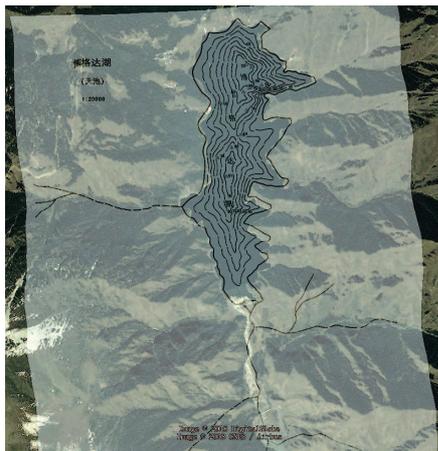
和我同年的刘卫东从小在外公袁复礼家中长大,现在是海淀区CDC的理化检验师,特殊时期担任疫情分析家。两三年前,他延续了上一辈从事袁复礼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有一天好奇,他拿起外公九十年前测绘的天池图放到谷歌地图上作比较,结果太神奇了,硫酸纸上的天池正好把谷歌上的天池轮廓严丝合缝地覆盖上了。

我猜想,那天刘卫东如果仰望星空,一定能看到外公在远处看着他,笑吟吟说:卫东,这个你就别费劲了,早有人检测过我的数据了:1937年我和清华师生长途跋涉去西南,路过长沙,马廷英从南京赶来攀谈。按他的理论,推算出天山东段雪线的标高是3700米,问我是否恰当。我告诉他:1930年7月我第二次上天山考察,从四个地点测定了常年不化的雪线,3700米是确切的高程。注意那是1937年,现在天池的水位是没有变化,但雪线高度发生了变化。人体的温度一百五十年间也降了0.4°C,对吧?这个你懂的。

马廷英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曾致力于“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对台湾海峡地区石油资源的考察与研究有重大贡献。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接收台北帝国大学,从此留在宝岛,成为台湾大学、文化大学地质系的创建者。

我相信,1937年他和袁复礼的交谈,也是两人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一个从冰川理论的角度、一个从实地考察的角度,竟然得出分毫不差的数据!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



袁复礼绘天池与谷歌地图所见高度重合